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缜密逻辑

■郭庆松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表述深刻指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基于此,《决议》同时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地位、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具备科学缜密的逻辑结构,实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从而铸就和夯实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地位、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这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自觉、历史主动、实践自洽。因此,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进行理论溯源、历史追问、实践探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理论逻辑

理论逻辑就是理论本身的内在规定性以及理论本身所具备的一套包含理论主题、理论基础、理论内核、理论任务、理论内容等在内的完整体系。

从理论本身的内在规定性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回答三个重大时代课题,即《决议》所指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上就是要回答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呈现什么样的面向以及如何建设和发展的问题。对于这三个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面向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为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现代化国家在新时代的面向就是,按照“三步走”发展战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且明确我们所要推进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科学内涵,也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路径选择、重要原则、战略安排;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新时代的面向就是,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明确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努力探索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

从理论本身的完整体系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题,就是党的十九大所概括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则是由这一主题衍生出来的并共同构成三个重大时代课题,这是《决议》的创新提法;理论基础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伟大的中华文明,以原创性理论贡献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入新高度,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理论内核是,“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以人民的需求变化为导向,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这个理论内核规定了理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理论任务是,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理论内容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从严治党等在内的“十个明确”的内容,这些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核心观点】

◆从理论本身的内在规定性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回答三个重大时代课题,本质上就是要回答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呈现什么样的面向以及如何建设和发展的问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逻辑,一方面,体现为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根植广袤中国大地和中华民族历史,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另一方面,体现为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成果,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伟力正是体现在其源于实践、回应实践、遵循实践规律并取得一系列实践成果,得到实践的检验并促进实践的自我超越,这集中体现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具体表现为《决议》所总结的“十三个”方面成就。

历史逻辑

历史逻辑是对理论发展历史渊源和历史规律的遵循和坚守,体现为理论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规律性。历史逻辑是理论逻辑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理论逻辑是以历史逻辑发挥作用为客观前提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逻辑,一方面,体现为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根植广袤中国大地和中华民族历史,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是就其历史渊源而言的;另一方面,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成果,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从而得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原创性理论成果,这是就其历史规律而言的。

从历史渊源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根据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升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个领域都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释放出强大的思想伟力,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发展性的鲜明特征,以全新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时代的贡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新的飞跃。与此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立足于现实的中国,又植根于历史的中国,它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中承继人文精神、道德价值、历史智慧的精华养分,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彰显文化自信、饱含历史自觉、赓续中华文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精神升华。

从历史规律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三次理论飞跃不断标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高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所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和遵循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新的飞跃,是对前两次飞跃的继承和发展,体现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理论飞跃,呈现的是我们党自觉探索和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遵循,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的理论创新进程,在不同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伟大成就。

实践逻辑

实践逻辑本质上就是理论源于实践并回应实践问题、遵循实践规律并取得实践成果。对时代问题的现实解题需要实践,对理论逻辑的效验和对历史逻辑的印证也需要实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逻辑居于基础地位。理论是认识升华的结果,认识又源于实践。人们的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这种反映只有在实践中、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完成,源于实践经由认识升华而形成的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形成丰富的实践成果,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论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扎实的实践根基、鲜明的实践品格和磅礴的实践伟力,体现理论发展鲜明的实践渊源;源于实践的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并不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重要的是对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的批判性反思、规范性矫正和理想性引领,这一创新理论正是以其批判性的实践反思、前瞻性的未来要求、理想性的世界图景而超越于实践,并促进实践的自我超越,从而形成一系列超越实践的发展成就。这些发展成就就是我们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必然成果。

如同毛泽东思想是在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道路中创立并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一样,也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通过创立邓小平理论、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科学发展观而完成一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实践问题中创立的,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党的十八大以后,外部环境变化给我国带来了许多新的风险挑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也面临不少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党治国理政面临方方面面的重大考验。新的伟大斗争呼唤着新的理论指引,新的伟大实践推动着理论创新步伐。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通过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积极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针对突出问题,以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实践之问,回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新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也可以引导实践超越自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伟力正是体现在其源于实践、回应实践、遵循实践规律并取得一系列实践成果,得到实践的检验并促进实践的自我超越,这集中体现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具体表现为《决议》所总结的“十三个”方面成就,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外交工作等。这些发展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昭示了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扎牢了历史链条、夯实了坚实基础。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同样,只要我们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不断用以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一定会进一步彰显无穷的实践魅力。

(作者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文化的激活与思想的交融

——读《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

■陈恒

“西方中心论”的突破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缺乏从内部突破传统框架的动力,因此呈现循环往复的特点,只有在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传统框架才得以打破,并迈向近代社会。这就是学术界熟知的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一种近代社会以西方为中心的史观。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局的风起云涌以及欧美内部的矛盾重重,一种新的史观开始出现,这就是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即在中国发现历史,该史观强调中国近代发展在于其内部的力量,而非西方的外力。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强调西方前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并不具有优势,工业革命在西方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即英国本土煤炭的利用和新大陆市场的开拓,是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启动的根源。虽然彭慕兰的观点有待于商榷,但这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种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是西方国家海外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也标志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使每个后起民族肯定本民族在从传统社会迈向近代社会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从而明确在世界近代化的过程中是作为参与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而不是被动地卷入这一历史浪潮中。

在众多肯定本民族参与世界近代化进程的著作中,张允熠教授的《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商务印书馆2021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著作**)是其中一本,也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在600多页的篇幅中,作者以高度凝练的手法把四个世纪中西思想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历史浓缩在其中。从明末利玛窦携西学进入中国开始,然后历经曲折的清朝中期,最后随着晚清以来西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思想、西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终于汇成一股思想潮流,从而改变了中国的整个思想界,完成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旷古空前的主流文化大转型。“中西马”三派的互动是作者对推进中国四百年来思想文化大变局中的概述,从中西哲学的相识相遇来看,利玛窦携西学进入中国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源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史前史”,而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被接受是四百年中西思想文化长期碰撞与交流的结果,是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必然,中国思想界遂完成了以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中西马”的合流。这一思想进程的逻辑,在《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一书中展现得十分明确。

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

该书集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为一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填补空白的著作。

首先,该书妥善处理宏观与微观叙事之间的关系。在六七十万字的篇幅中,作者纵览400年来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以宏观的视角叙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作者又能够以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立论中心,进行许多精细的描述,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深入的剖析解读。因此,宏观叙述和微观分析通过作者之手,在《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一书中完美地呈现出来。作者以四个世纪作为一个考察单位,却没有落入那种“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窠臼,而是宏观和微观同时兼顾,既见森林也见树木,宏大叙事的架构下,包含对单个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细致入微的描述。

该书的第二特点是有力驳斥了“西方中心论”。作者认为,中西思想的传播不是单向,而是双向:“对于欧洲读者来说,唯有读到介绍中国思想和学术的西文译著,才算是真正的互动和交流,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们,他们最大的贡献就在这里——他们通过对中国儒家经典的翻译,在西方人的眼前展示了灿烂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图景,从此,孔子的大名远播西欧,中国成为启蒙时代欧洲思想家向往的文明的样板。”从这个角度看,作者认为,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吸纳并改造了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那么马克思主义无疑含有中国思想文化的元素。

该书第三特点是研究资料丰富,文献多样化。首先,文中既有中文资料,也有外文资料,既有自家之言,也有他家之话,这对一本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来说,无疑增添本身的可信度。例如,该书提到《剑桥17世纪哲学史》肯定中国哲学在促进欧洲近代哲学产生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用来支撑作者认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结论。其次,在叙述近代以来的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历程中,作者采用的多是原始文献,例如《民报》《万国公报》《新民丛报》等具有影响力的报刊资料,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最后,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并重。我们既能读到每个时代的原始文献,也能看到当今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

“中西马”互动完成大转型

自从明末利玛窦携西学从南方进入中国以来,期间经历清朝自1723年禁教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将近120年西学处于被禁止传播的历史,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西方侵略者的大炮轰开,西学又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尤其到了19世纪末,中国真正迎来了一个西学全面东渐的时代,最后是马克思主义从东、北方系统地传入中国。在接近400年的历史中,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中国思想文化也传到西方,推动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最终以先进西方哲学的最新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传到中国,这场哲学革命洋溢着一种批判精神,其成果必然是“中西马”三派在冲撞式的互动中达到新主流的形成。“中西马”三学的互动完成了二千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大转型。正如书中所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时,它就能化成强大无比的精神力量,继而转化为强大无比的物质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具体实践和中西思想交往的必然结局,是400年来“中西马”互动和融通的最高理论形态和最新思想成果——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思想主线,也是作者的创新理论和写作宗旨。

《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是一部优秀的理论著作,也是一部展现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史的佳作。但是,瑕不掩瑜,指出书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也是有必要的。第一,虽然作者兼顾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平衡,但限于篇幅,注定作者只能选取一些重要的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片段,而遗落一些次要但也不是不重要的部分,例如一些不是那么有名但也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第二,书中突出知识分子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却很少关注底层人群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中的身影。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世界史系教授)